

布哈林问题 论文资料汇编

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资料室

评《布哈林与“建设社会主义”》

〔英〕阿列克·诺维

由于斯蒂芬·科恩写了布哈林传记，我们都受益非浅。它提供了如何写这类作品的榜样。对于现在的会议来说，他的文章是富于思想，简短而又抓住了要害。它为讨论提供了充分的根据。

我自己的评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要评论科恩提出的布哈林与新经济政策问题，第二部分我希望促进关于布哈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剧烈争论的范围与起因的讨论，他们的争论帮助了斯大林取得最高的权力。

我应该同意科恩的这种意见 即俄国当时没有“民主的途径”。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问题是“有没有代替斯大林主义恐怖的途径”。布哈林当然不是自由的民主人士，他并且很了解压制所有其他党派对于继续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和建设他所理解那样的社会主义是绝对必要的。他也很了解党的专政带有严重的危险：“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衰退的危险……，从劳动群众出身涌现出来的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①科恩在他的书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布哈林既然意识到官员蜕化的危险，为何没有支持那些反对这种倾向的人，并且在他攻击左倾反对派时，他反而加强了他应该

意识到的已成为自己敌人的地位。一般的回答是：因为他害怕左倾反对派的政策对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后，我还要论述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布哈林持有这种观点，确无疑义。

布哈林确实全心全意地支持新经济政策。（关于他从战时共产主义理论家“转变”为新经济政策重要支持者的问题需要另写文章阐述。）他相信在“工农联盟”的强制下，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慢慢地逐渐建成。农民，甚至富农将会逐渐知道合作的好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使用暴力，在可预见到的将来，城乡经济关系将是市场关系。国营工业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农民的需要。布哈林所持的观点是农民的过重负担会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这就会给国营工业的销售带来不利影响。当然他理解工业化的重要性。“必然会发生从小生产者到资金积累之间的价值转移。”工业化一定要实现，“否则我们会倒退。”^②问题不是应不应该有不等价交换。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里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一定如此，虽然他可能感觉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剥削”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并且是危险的——意指工人阶级“剥削”农民。他知道积累就需要牺牲：“由于我们让人民作出牺牲以取得需要的资金而有时受到指责。但没有其他‘牺牲’办法！”^③关键在于不等价交换的范围。1923年城乡贸易关系非常不利于农村，以致每个人，包括托洛茨基（他已创造了“剪刀危机”一词）都看到了降低国营工业产品价格之必要。布哈林认为国营工业和农民都不应该提高价格，他认为价格就应该是“首先保证国营工业生产力和农民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是互相需要的。^④

布哈林也相信竞争。他坚持私人企业在法定范围内有权

存在并不应该遭受没收性的赋税或警察措施。他象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大规模工业所固有的优越性。通过经济竞争它一定会战胜私人企业，而且一个有效率的国家与**合作商业网**会使私商变成多余的。反之，如果国营工业效率低而成本又高，国营商店很少又不好，“私人企业”就有权存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的“未来主义”著作中《**从新经济政策到社会主义**》（写于1923年），也预想到社会主义工业和商业的优越实力会逐渐消灭私营部门。诚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未谈过小资产阶级将被社会主义警察所消灭！

同和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布哈林认为一旦社会主义建成，就没有市场的位置，虽然他赞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因此，他不应当被称为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先知。而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我们却可以找到这样的坚定论点，即市场结构的需要将“贯穿着整个过渡时期”。关于这一点后面将再加论述。

理查德·戴在他非常有趣的论《托洛茨基与经济孤立的策略》一书中提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不同，他主张自给自足的经济，并说这是他们对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我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分歧不大。没有人（肯定更不是布哈林）怀疑必须从发达的西方进口机器。问题在于贸易范围和工业化速度，并且这就再次提出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有多少机动余地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的问题，科恩的说法很可能是对的，他说布哈林的思想包含着在更先进的国家里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在1924年到1926年时期肯定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非常了解俄国的落后，因

此会承认确实有其他道路可走。布哈林辩解说“如果我们对我国国内有足够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信心，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十月里去攻打街垒；那么孟什维克就是对的，他们说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试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是对的，即没有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我们必然会与农民冲突，而且要失去他们。”^⑤在同一个发言里，布哈林回答问题时强调指出，没有外部的援助，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一个长时期，至少要几十年。但他的关键问题是：“假如国际革命长期拖延，我们还能走向社会主义吗？……。或者我们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必然要毁灭我们吗？当然在我们爬行到社会主义之前，一些其他国家会发生革命，这是真理，但并不因此就会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说的那样，我们由于落后一定会垮台……。没有外面的援助，我们将慢慢地前进，但我们一定会前进，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⑥

关于托洛茨基对农民的论述肯定和他1905年论不断革命的思想有关。戴那样说是对的，首先托洛茨基小心翼翼地不去直接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可以“建成”的看法。“建成”一词有些模棱两可。说一国不能建成，听起来象是失败主义，但一个人可以断定大楼只能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中建成。季诺维也夫在这时是“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建成”的最突出的反对者，反对的人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的《苏联制度中的经济平衡》一书（1927年版）最近已用英文再版，并加了很好的评论。^⑦他在书中说没有西方革命的支持，苏联所处的矛盾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顺便提一句，我怀疑我们应否把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政策和

市场方面的观念等同起来。因此，假如科恩在他书中（第164页）断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支持1923年的“剪刀价格”是对的（托洛茨基肯定没有那样做）。

这进一步引出一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对布哈林思想的理解问题。一个是在全部讨论中关于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含义。它是从原则和定义方面来说不可能吗（那就是说，无论在何时和何地“建成”社会主义，如果在一个国家建成，即使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或者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落后的俄国所具有的束缚和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吗？另一个和第一个问题有关的问题就是：布哈林低估了那些束缚吗？他实际上是否有一套可行的政策？

科恩在他的书中表示他也感觉到布哈林过于乐观了，布哈林低估了在重建时期以后新的投资费用。即使1926年略有提高的投资也很快地导致了“货物奇缺”，过度紧张，与农民市场关系的困难，虽然错误的价格政策无疑地促使情况恶化。到1927年时就有经济危机之感，并且布哈林自己在所谓富农的重要问题上已经改变了态度。他当然不赞同用暴力消灭他们，但同时却从他1925年更有逻辑性的主张后退了，那时他极力主张农民“发财致富”。在曾经引用过的一篇列宁格勒讲话中，他说富农是“我们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因此，“我们应该用一切办法打击他”（第336页）。但富农（对这个名词从未下过定义）是有成就的农民。在明显地需要增加农产品销售量的情况下，把农业的基础放在无成就的农民身上，把有成就的农民当成“我们的危险的阶级敌人”肯定是行不通的！我已经在别处发挥了我的主题，在这里我就不再

多说了。

应该提出一些关于1927年的严重危机的新材料。这在德国档案中可以查到，是关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逐句记录报告，时间可能是1927年10月。记录的发言人有托洛茨基（不断被人打断）、斯大林、契切林、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M·赖曼在最近的论文里详细地引证了斯大林的发言。^⑧档案的内容是个谜，其它所记录的讲话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但基本内容是清楚的，并且可以证实：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工业和农业，伴随着还有战争恐惧。这导致了与新经济政策不协调的紧急措施，并很快就导致了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分裂。它们构成了开除托洛茨基的背景。这不就使得布哈林的政策处于混乱状态吗？他反对斯大林的暴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出他所选择的解决办法。

最后，还要说几句他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在流亡时期写的著作中，托洛茨基着重谈到这些分歧。并且经常把布哈林当作最主要敌人，把斯大林看成只是“中间派”。布哈林在1923年以及其后用很大精力攻击过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支持这两个人的人以及给这两个人写传记的人，曾设想他们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对立的。因此，科恩在他的书中第156页上把托洛茨基和一些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那些人（在1923年）要求“脱离当前的农村市场来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工业”。但事情并非如此。科恩自己就正确地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位“新经济政策者”，^⑨那就是他在这个时期接受了新经济政策的逻辑。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托洛茨基强调加强农民农业的需要，并提倡“农民应该富裕起来”。^⑩

富裕起来与发财致富的区别何在？托洛茨基强调计划与市场同时存在的需要。他确实认为需要加强计划，更加重视重工业，但他很了解1923年到1924年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性质（极度通货膨胀刚刚停止，剪刀危机刚刚解决，毁灭与饥饿在人们的头脑中记忆犹新）。在1923年10月24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里，托洛茨基把计划说成是“在适应农民市场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基本部门的系统的协作”（重点是我加的）。⑪在他《新方针》一书中，他写道，他们应该“根据既定的计划，运用市场条件的可靠知识和正确经济预报使国营工业与农业协调”；⑫并且“我们必须使苏维埃工业与农民市场相适应”。⑬一个人应该知道“要把整个工业适应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联合需要较多的较便宜的工业品，这一点“除非根据既定的计划合理地组织与管理工业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是用压制市场的办法而是要放在市场的基础上”。⑭至于富农，1926年季诺维也夫做出重要的批判，理查德·戴引证1925年托洛茨基的话说，“富农——较富裕的农民——通过卖粮食使得国家获得外币，用这些外币就可以进口机器……。这是积极因素。这可以促进向社会主义迈进”。⑮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下列事实，即托洛茨基自己在流亡时期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反对托洛茨基的历史学家们都歪曲了他在1923年到1925年时期实际上所主张的，他所写的和他所说的。

在曼德尔的小册子里可以看到一个误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范例。曼德尔认为托洛茨基在1923年主张给工人“提高实际工资”，“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和加强农村的阶级斗争”。⑯如果这确实是托洛茨基的政策，那么，布哈林感到恐怖就是非常对的。但这样的政策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1923年的

形势下它是矛盾的，也是完全行不通的。我仔细阅读了那时候托洛茨基的著作（特别是《新方针》，和他给中央委员会批评实际上正在执行的政策的书信），看不出有支持曼德尔解释的迹象。

至于市场的作用，从1922年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例如，这里引用的是他在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如果有个万能脑子……，同时记下自然和社会所有的过程，衡量它们的动力，预测它们互相作用的结果，那么，这样一个脑子毫无疑问地就可以编造无错误的完整的国家计划……。确实，官僚机构有时认为它就是有这样脑子。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之容易把它自己从市场和苏维埃民主的监督下解放出来……。参加经济方面、国家方面、集体与私人方面的无数活动着的人不仅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汇编，还要直接通过供求的压力来表示他们的需要与他们相对的紧张程度。这个计划要受市场的检查并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市场本身的调节应以它自己表现的趋势为基础。办公室制订的草案应通过商业核算证实它在经济上的合理性。过渡时期的经济不受卢布‘支配’是不可想象的”。^⑩在观察各阶层与各种目的之间争论的必要和必然的冲突之后，他继续说：“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个部分的互相作用，才能正确管理过渡时期的经济”，这就能在广泛的革命提供新的机会之前，减少必然要发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他的切合实际的结论包括了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和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卢布。

当然，他认为最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市场将不存在，布哈林也是这样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原则性的

分歧。

那么，这两位天才人物互相敌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人物个性之间的冲突吗？是对托洛茨基冒险主义的倾向不信任吗？毫无疑问，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有观点上的分歧。并且布哈林真正感觉到托洛茨基1923年以后的路线会严重地危害新经济政策的让步。然而，只要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共同对政策负责，他似乎是比较比一些人所相信的更为稳健。管理不善和缺乏他认为应该存在的那样计划实际上是和农民市场的需要有联系。例如，农具的缺乏是市场供应的严重失败，还有不良的政治后果——使得那些有犁、有耙、有扬谷机等富裕农民比其他农民有更多的权力。托洛茨基主张的工业投资可能太多了一些，但并没有他敌人所说的那样大（也不象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所说的那样大）。他和布哈林一样从战时共产主义经验中学到了同样教训。他不主张恢复那时的作法。确实，他谴责过“企图用时战共产主义时的作法控制价格”。^⑩（以后在这十年后期他在价格问题上缺少些合理论点，但那时他已是反对派）。如果他要是负责1923年到1925年的经济政策，人们不清楚它会有多大的不同。在新经济政策的束缚下，机动的余地很小，这是在那时大家都承认的。

我得不出结论来。党内最有天才的两个成员用了那么多的精力互相攻击，这显然对党是个悲剧，对斯大林后来消灭的这两个人也是悲剧。

至于“布哈林主义”途径的可行性，尚无结论。总之，即使布哈林是懦弱的和前后不一致的，这决不能成为替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所带来的恐怖的“辩护”。

引语出处：

1.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由海特曼出版社出版：《在俄罗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纽约1967年版，第171页至172页。

2. 《论有关托洛茨基主义的各项问题》（莫斯科，1925年），第68页。

3. 《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莫斯科，1927年）第66页。

4.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海特曼出版，第275页）。

5. 《在列宁格勒会议上所做的报告》（1926年），海特曼出版，第340页。

6. 出处同上，第347页。

7. 《苏维埃工业化的危机》（编辑，D·菲尔兹），纽约，怀特普莱恩斯，1979年

8. M·雷曼

9. 《斯大林主义》（编辑，塔克），第22页。

10.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322页。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布哈林后来说的关于农民经济的重要性，是插进来反对托洛茨基的思想，但其他引证的话表示这与托洛茨基那时的思想不一致。

11. 托洛茨基：《左倾反对派的挑战，1923—25年》（帕特芬德出版社，纽约，1975年）第60页。

12. 出处同上第118页至第119页。

13. 出处同上第137页。

14. 出处同上第138—139页。

15. 戴，第114页。

16. 《托洛茨基》(NLB), 伦敦, 1979年), 第82页。
17. 《反对派公报》(1932年), 第5期 第8页。
18. 《左倾反对派的挑战》, 第59页。

(李玉斌 译)

布哈林和“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布哈林在苏联历史上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

〔意〕 波洛尼亚大学 弗朗西斯科·本维努蒂

最近十年代表的一些论文，对苏联问题专家和社会舆论关于苏联建国几十年的历史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关苏联历史上关键时刻的资料，我们掌握的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丰富，我们的思想焕然一新。这一切，主要是莱温（Lewin）（1967年），麦德维杰夫（1972年）和科恩（S.Cohen）（1973年）的功劳。莱温和科恩的作品大量地引用了埃尔里什（A.Erlich）（1960年）和洛威（Lowy），（1969年）的研究成果；他们试图用新的观点探讨早已提出来的、一部分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不同派别的实质；新经济政策末期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源；对斯大林制度的组成和发展的分析；促使加速实现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客观条件。“布哈林问题”是走这条道路必然要碰到的问题之一；从许多方面讲，它又是这些问题中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很可能，当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苏联问题专家在布哈林就苏联政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就迎刃而解了。我想，科恩的著作问世之后，人们期望已久的、对布哈林的思想、活动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的

愿望，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他的著作正是谈的这个题目。

现在，我想就科恩提出和研究的许多问题中的三个问题发表我自己的看法。这三个问题是：（一）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哈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二）布哈林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三）布哈林的战时共产主义遗产。

（一）布哈林关于二十年代苏联内部政策的思想是一个有连贯性的、有机的整体，所以，当我们说他的思想体系时，可以称之为“布哈林主义”。当时，布哈林不只是简单地描述并捍卫这个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且勾画出它将要发挥的巨大作用和进一步发展的远景。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布哈林所提出的成熟的思想，首先是为了满足当时他所为之献身的、特殊政治需要的产物。他的主要的著作都是为布尔什维克革命面临的两个深刻的危机——政治和思想危机找出路。我认为，布哈林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危机给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众所周知，这是指的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剪刀”危机；左翼反对派的形成）和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商品奇缺”；在国际上被孤立）这一时期。这两个危机在党内造成了意见分歧和思想紊乱。布哈林比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更加强调地指出：如果人们看不到在新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远景，就会使党削弱，并使党变得不稳定。从这种意义上讲，即使布哈林经常把经验主义和对俄国特殊情况的分析当作理论看待，他仍然可被称为二十年代的“理论家”。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它的不断发展和

“进化”的特点上升为理论，并把它作为“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是十分重要的。难怪科恩对此加以证实，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史范围内给予高度的评价。

布哈林解决第一个危机的方案的特点是涉及面极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最早是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意见，则带着明显的经济色彩。而当时斯大林却在致力于制定一个专制的政治制度、研究党的领导组织艺术并建立基本的“传送带”。起码，在“统一反对派”形成（一九二六年）之前，只有布哈林提出了蕴藏着“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萌芽的政治、经济、社会蓝图。当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得已而走的道路——的理由已经开始枯竭（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他支持新经济政策），富有战斗力的、训练有素的反对派有可能使党的政治领导发生变化，并在短期内有破坏市场经济的危险时，他提出了这些观点。

所以，一般人们不认为布哈林是一个经济学家或经济发展战略家。我认为，在科恩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他打破了对工业化问题的一般的、笼统的叙述，并具体地指出了二十年代后半期所发生的政治、思想冲突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过分地强调布哈林在经济学方面的一些具体观念，就会有走向邪路的危险。他从在周转中积累的“理论”迅速转到从社会化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以外的经济中直接“抽取”的理论，说明他的路线的核心不在这里，而在其他方面。他的经济平衡的理论和他一整套关于市场、竞争、生产各部门要按比例发展的理论，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平衡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看到了社会的脆弱性和领导集团的孤立状态。

这样阐述布哈林的思想，并没有避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苏联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和一九二五年布哈林所起草的指示是一致的。依我看，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在经济政策方面，他的某些比较固定的思想（如农业机械化，广泛地推动集体化）遭到了冷遇。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国家不顾布哈林的批评，又采取了一系列左倾措施。在这一时期内，除了关于规定工业价格之外，无论在他的文章中还是在他的讲话中，都找不到有关经济政策的具体指示。在他后期所写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他对苏联经济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建议，这在他一九二八年十月以前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所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对当时制定经济政策的负责人（如李可夫，他在政治上是靠近布哈林的）的思想和所作出的决定倍感兴趣。

从布哈林解决第二个危机的构思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其中有一部分与上面所分析的特点相似。

科恩指出，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是在国内战争中产生的，与国内战争刚刚开始时相比，当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根本的变化是规定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布尔什维克党就认识到，苏维埃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落后，而且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就是说，需要发展经济，尤其要发展工业，以便赶上西方强国的水平。关于这些变化，请看列宁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围绕实现电气化计划所进行的讨论（一九二〇年）。但是，在列宁的最后几篇遗著中。与其说他强调迅速进行工业建设，毋宁说他更重视对人民的

教育。例如，他号召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号召扫盲，进而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和物质文明水平；要求加强纪律，谦虚谨慎，遵守法律（成文和未成文的）；号召人们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等等。这些都是西方公民必须具备的第二个天职。“现代化”所包含的这一方面的内容（这与列宁一九一八年的著作有许多共同之处）深深地吸引了布哈林——列宁“遗嘱”的热心的读者和解说者。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这一段时间里，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这方面的内容占了显著的地位。布哈林认为，当时，工业基本建设和新项目的投资的速度已达到了顶峰，为了进一步加快建设的速度，他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口号。一方面，制定计划的机关应当学会不犯错误；另一方面，应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实行农业集体化。农村的目标，仍是列宁所指出的：建立一个“文明的集体农庄庄员”为多数的农村。列宁还有另一个指示：要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以便挖掘潜力。这一指示对工业同样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合理安排、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和建设成本的问题。还有一个显然是与伦理学和文化有关的口号，即智育改革。二十年代布哈林的最后几部作品都集中地谈到了要为消除“不文明”、“地方主义”和“莫斯科心理”而斗争的问题（列宁决不是“莫斯科心理”的支持者）。

“建设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使苏维埃文明化。

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中间没有一个——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反对派——象他那样强调关系到俄国革命的“落后面”。因此，二十年代后半期他更加孤立。在布哈林政治思想中，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落后面”所占的位置和他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